

·内部刊物·

西北历史资料

1982 1

(总6号)

目 录

汉代羌族的部落组织·····	王宗维 (1)
柔然的兴起及其内部的氏族部落组成·····	周伟州 (10)
清季关于新疆问题的争论·····	赵春晨 (25)
从远古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央亚细亚地图·····	(苏) 舒金哪 著 姬增禄 译 (36)
唐代凌山地理位置考辨·····	李健超 (44)
唐关内道驿馆考略·····	李之勤 (50)
唐代长安太平坊·····	胡 戟 河 洛 (68)
王征遗文录·····	志勤辑 (72)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二年四月

汉代羌族的部落组织

王宗维

经过夏、商、周三代族的共同体的发展，分布于泾、渭、伊、洛等黄河中游地区的诸羌部落，基本上都融合于华夏族之中。秦始皇西逐羌戎，河、湟地区仍有大批羌人居住。《后汉书·西羌传》概述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状况时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姪，故国无鳏寡，种类繁多。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这种社会组织和生产形式，是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羌族在汉代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影响着羌族的发展；羌族对汉朝的政治、经济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羌族还没有形成国家政权，也没有形成脱离劳动与劳动者对立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社会单位是与其生产水平相适应的部落组织。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西羌传》称：自无弋爰剑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又说：其“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椎最强，胜兵十余万。”这是东汉末年汉朝政府对西羌部落状况掌握的资料。此外还有许多“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的氏族部落，分布在西南广大地区，不知道他们的生产状况和相互关系，说明东汉政府对羌族部落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这里所说的“种”，是指氏族和部落两种族体，但基本上是指部落。氏族必须结成部落才能生存和发展。汉代羌族究竟有多少部落，是无法搞清楚的。

羌族传说中把各部落的首领都说成是无弋爰剑之后的分支，我们只能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神话。这种以“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的传说，作为诸部落具有“共同世袭的证据”①，借以加强部落之间的关系，这是古代各民族传说中所具有的共同现象，与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99页。

华夏族的祖先出自黄帝之后的传说一样。但是，只要我们加以分析，吸收其合理成分，仍然可以作为研究羌族部落相互关系的依据。大致说来，河、湟地区的羌族部落与无弋爰剑氏族的血缘关系可能比较密切，其他地区就比较疏远。

从两汉书和其他有关资料中所见的羌族部落名称大约有五、六十种，这不包括临时带兵以军事首领的名字称部落的现象，如滇零之子零昌等，也不包括汉代被称为“西南夷”，而不称为羌的那些与羌同源的各个部落。能略述其始末的不过四十种。当然，部落的实际数目当远远超过这些数字。如和帝永元六年（94年）蜀郡徼外大群夷种羌五十余万口内属，此“五十余万口”绝对不是一个部落，而是很大的部落联盟。此外像钟羌胜兵十余万，内部也包括许多部落。部落没有固定的规模，二、三个氏族就可结成一个小部落，这样，数十万口人的部落联盟所辖的部落就相当多了。

汉代羌族部落的命名，大概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以动物名称命名部落名，这种情况似乎比较原始，可能早期西羌部落名称大都采用这种称号。汉代史籍中保留的这种名称有黄羝、白马、参狼、鹿牛、黄牛等数种。这种名称是表示他们的图腾崇拜，还是反映其饲养业的特点，抑或兼而有之，我们还不能肯定。

黄羝，是一种大角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现的古墓群中有以大角羊为题材的花纹图案，还有许多残留骨骸^①，看来，这可能既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可以作为把它猎获后当作肉食的证据。这对从事狩猎的羌族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黄羝部落可能是河、湟地区早期居住的土著部落之一，这个地区出土的遗物中有许多羝骨骸，说明他们和黄羝接触频繁，关系密切。到了西汉，黄羝部落仍然住在湟中。西汉宣帝时，赵充国用兵湟中，一部分黄羝羌降附，被置于金城属国管辖之下，一部分外迁。后来黄羝部落出现两支。一支北上越过祁连山，到甘肃武威县南。东汉初年任延任武威太守时，说郡境“北当匈奴，南接种羌”，任延选休屠、黄石精锐，分屯北方、南方要害^②。休屠原是匈奴休屠王所统辖的部众，黄石羌就是西汉时的黄羝羌，《后汉书》讹传为黄石羌了。一支东下，徙居于武都塞外，也被写为黄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冉駹“其西又有三河、繁子虏，北有黄石。”到十六国时，其中一支北上，居住在上邽（今甘肃天水）一带，后秦在此置大羌黄石戍以领其众^③，此部落名又转为地名了。

鹿牛，牛的一种，其毛可织毡、氍。上引《南蛮西南夷传》称：冉駹国，“有鹿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氍。”又说，“其人能作鹿氍”。可见鹿牛既是当时一种很好的肉食动物，又可以其毛作毡，制成衣物、帐幕抵御风寒。同书又载：蜀郡徼外夷“贡黄金、鹿牛氍举土内属。”氍是一种装饰品，其作用类似纓。能与黄金并列进贡，可见是羌族出产的一种珍品。

鹿牛在羌族地区分布很广。冉駹是“六夷，七羌，九氐”之地，盛产鹿牛；蜀郡徼外，亦有鹿牛，越巂鹿牛羌更是出产鹿牛的中心地区。《西羌传》载：“或为鹿牛

①见《青海日报》1981年1月11日。

②《后汉书·循史任延传》。

③《十六国疆域志·西秦》。

种，越嶲羌是也”。越嶲羌并不分布在越嶲郡，也不是越嶲羌因越嶲郡而得名，而是都因越嶲水而得名。越嶲郡是因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兵至此，“从越嶲水伐之，以为越嶲郡”^①，而越嶲羌是因旄牛羌居越嶲水下游，其迁徙于此的时间比元鼎六年早得多。西汉开蜀郡，置沈黎郡，把大批旄牛种羌民排挤到蜀郡徼外山谷之间，留在郡境的旄牛羌为数不多。所以沈黎郡境的旄牛羌和蜀郡徼外羌，原来应该是一个部落联盟。冉駹地区的羌人可能是从这个联盟中分出。是在迁徙过程中留居于此的，还是以后北上徙居于此，我们无法断定。总之，旄牛羌与生产旄牛大有关系。

白马羌在广汉，黄牛羌在西域葱岭^②，其得名大概也属于上述情况。唯武都参狼种羌的参狼，是不能饲养和肉食的，它是游牧民族敬畏的一种凶兽，往往加以崇拜。突厥以狼为图腾，西南夷中有白狼部，后称为白兰羌，不管传说作何解释，都是对凶神的崇拜。

一种是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主要是从无弋爰剑血缘亲族于孙中选其“豪健”者的名字为种号，这在河、湟地区诸部落比较盛行。《西羌传》称：“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及忍子研立……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东汉安帝时，先零羌中的一个首领滇零崛起，史称其部为“先零别种滇零”，另成部落。

上述研、烧当、滇零，都是父系名称，没有以“母姓”命名的。烧何种羌有妇人比铜钳者，“为种人所信向”^③，在该部落中实际上已成了众望所归的首领，但部众并没有以“比铜钳”为部落名号，仍沿用烧何。可见，至少在河湟地区已经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部落名称通用父系名称，就是最好的标志。恩格斯说：“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接着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④

西羌部落中“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具体表现为他们的父子连名制。如滇良之子滇吾，滇吾之子东吾，东吾之子东号；迷吾之子迷唐，滇零之子零昌等即是。这些人都是分别继承其父业，充当部落首领的，而且长子继承权似乎也得到习惯法的认可。兄弟之间似乎也有排辈的习俗，但不很严格。如滇吾之弟滇岸，东吾之弟迷吾、号吾等。但是，烧当与烧何、烧何与封何，封何与封养、封煎，牢姐与乡姐、勒姐、弥姐、累姐等，他们是什么关系，是父子，还是兄弟？不管怎样，他们之间有某种血缘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族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一个部落随着条件的变化，可以分成几个氏族部落，也可以互相合并。分支部落出现以后，往往又以豪健者的名字命名部落名，于是产生了一批新的部落；而另外一些部落衰弱下去，依附于强者，这就形成了羌族部落名称多变的现象。

①《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鱼豢：《魏略》，转引自《三国志》注。

③《后汉书·西羌传》。

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页。

还有一种是以地名命名部落名，这大都是他称，并非自称。如称鹿牛种为越嵩羌，白马种为广汉羌，参狼种为武都羌等。这些都是部落名与地名并存，关系比较清楚。

有些部落名称，关系就不清楚，如白水羌、黑水羌、赤水羌、塞外羌等。很显然，这些名称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本部落的自称，羌族当中必定有本部落自己的称呼，可惜史料没有保存下来。还有一种如大群、龙桥等羌，是地名还是部落名？也许大群就是大羌，龙桥就是龙羌，因为群、桥、羌音很相近，羌是自称，大是形容词。

白水羌和黑水羌是因居住在白水和黑水而被称此名。据《水经注》载，白水和黑水是白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这里原是参狼羌分布所在。后来，称居住在白水谷地的部落为白水羌，称居住在黑水谷地的为黑水羌。这部分羌人后来又有分支，一部分徙居到广汉属国的阴平山谷，但名号仍以白水羌、黑水羌称之^①，似乎本部落已经接受了这种称号。

有些不是因地名而称部落名，恰巧相反，而是由部落名命名地名，如勒姐羌居住之地有勒姐溪，长离种羌居住之地有长离水等。

《水经注》载：“湟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勒且溪，北流径安夷县城东，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号也。”这里没有提勒且溪得名的来源和勒且溪与勒姐羌的关系。而《后汉书·西羌传集解》则称：“勒姐羌居勒姐溪，因以为种名”，正好把事情颠倒了。以“姐”为部落名，这在羌族史中屡见不鲜，勒姐即其一种。勒姐羌在汉代一直居于此，虽然在几次战争中向东、向北、向南迁徙，但最后还有一批人在这里，说明是该部的根据地。东汉初年与卑湊种羌联合反击汉陇西、金城郡守的压迫，之后仍居于此。东汉三次羌民大起义，勒姐羌都积极参加，每次失败后，仍返回原籍。这样日久天长，就以其部落名称称溪名，《水经注》成书时，勒姐羌组织名称已经发生变化，而勒姐溪名称仍然保留下来，后人错把部落名与族名的关系颠倒了。

长离羌是烧当羌的一支，与那离种羌大概是兄弟部落。《西羌传》载：永和三年（138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复西招羌胡”。可见那离种羌是烧当羌失败后另立旗号的一个分支部落。又《水经注》载：“瓦亭水，南径陇西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烧当羌居之。”《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载：夏侯渊追韩遂至兴国城，因城守坚固，以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长离诸羌多在遂军、必归救其家……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这是调虎离山的一种战术。此长离羌所居之地正在长离川。《水经注》记此川为“烧当羌居之”。则长离羌就是烧当羌失败后内迁的一个分支部落，后来又以其部落名命名水名了。

至于守塞羌，保塞羌，徼外、塞外羌，义从羌等，都不是部落名称，而是汉朝政府根据他们居住的位置、对汉朝政府服役的性质等情况分别称呼的，与部落名称毫不相关。

二

部落是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但是，为了发展生产，便利经济交流，保卫本部落人民和财产的安全，部落之间必须结成联盟；而部落内部随着人口的增加，发展生产的

^① 《华阳国志·汉中志·阴平郡》。

需要等原因,又在不断分化,产生出新的部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正是这种联合、分裂,分裂、联合的具体表现。

无弋爱剑是西羌部落组织中早期比较大的部落联盟首领之一。由于他把秦国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羌中,并“教之田畜”,于是“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①,遂成了河、湟地带诸羌部落敬信的领袖。

部落联盟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组织。由于它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作为纽带,因而它随时都有分裂解体的可能。分裂以后由于某种原因又重新联合起来,不久又会分裂。在没有形成共同的经济基础之前,这种反复会不断出现。无弋爱剑为首的大部落联盟,为时不久,也就解体了。

部落与部落之间不是结成联盟的关系,“便算是处在战争状态”^②,保持敌对局面。要结成联盟,首先就要解除敌对状态,交换信物,取得双方的信任和谅解。“解仇”、“交质”、“结盟”,这是西羌部落间常见的现象。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开地广境”^③至湟中地区,触犯了羌民的切身利益。于是,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④,合兵十余万,起而反抗。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羌为了北渡湟水放牧,和汉朝地方官发生争执,汉朝政府闻报派兵镇压,于是“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⑤。东汉章和元年(87年),烧当羌豪迷吾降汉,汉护羌校尉张纡施毒酒中,设伏兵诛杀羌族豪酋八百余人,引起诸羌部落的愤怒,于是迷吾之子迷唐“与烧何、当煎、当阬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结盟。”^⑥

西羌的部落联盟,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期比较稳定的联盟,一种是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联盟,即临时性的军事联盟。

比较稳定的联盟,规模一般比较小,相互之间不仅有某种血缘关系,而且还有经济上的联系。这种联盟在战争前和战争后同盟的组织联系长期保持。

罕开羌是罕种羌与开种羌的部落联盟,开又分大开、小开。这个“开”很可能是由“研”种羌发展而来。研种羌曾经是西羌中最大的部落联盟,是无弋爱剑的后裔直接统领的部落。后来研种羌分裂,其中一部分仍保持“研”的称号,研又变为开^⑦。这个部落联盟至少在西汉中期已经形成,赵充国出兵湟中镇压先零羌时,罕开羌曾积极配合,其首领被封为侯。罕开羌的分布地区东起枹罕(今甘肃临夏),西至青海湖西,南到贵德、循化,与先零羌杂居,其中心地区后来转到枹罕,枹罕侯曾治于此。罕开羌以后曾多次参加反抗汉朝压迫的羌族大联盟,但失败后小的联盟组织依然存在。汉朝徙其一部于天水郡,置罕开县以居之。迁入其他各地者,仍称罕开。南北朝时时期,渭北高原有罕开种羌,至今关中铜川等地有以“罕开”为名的村庄,虽然居民已经变了,但从村名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8页。

③④⑥《后汉书·西羌传》。

⑤《汉书·赵充国传》。

⑦“研”的原字为“𦣻”,“开”的原字为“𦣻”,开又写作𦣻。《汉书·赵充国传》一律用“开”,所以本文从《汉书》一律用开。

看，无疑是罕开部落的羌人居住过的地方。罕开种羌后来分成许多分支部落，但仍以罕开为名号，可见这个部落联盟是一个牢固的联盟。

先零羌比罕开羌的组织大，原居地是以湟中为中心向四周发展。从居地看，它也是无弋爰剑之后，但不是嫡系，他们把嫡系烧当羌排挤到大允谷（青海共和县东）后，占领湟中，使自己发展起来，成为羌族中很大的一支力量。从西汉到东汉，政府多次用兵于羌，主要是对付先零羌；数次内迁诸羌于内郡，大多数也是先零羌。但先零羌似乎成了打不散、迁不完的一个部落联盟。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汉朝军队彻底平息了先零羌，但它消声匿迹七十年之后，到永初元年（107年）突然又在首领滇零的领导下爆发，从陇西塞外打到安定、北地等郡，席卷陇东，在北地郡自称天子，成了东汉第一次羌民大起义的中心和代表人物。

先零羌败而复兴、兴而复败，坚持数百年之久，是什么力量把他们连系起来的呢？恐怕“血族复仇”在这方而起着很重要的联系作用。先零羌既然是无弋爰剑的血亲部落，所以内部就构成了密切血缘关系；加之，长久居住在河、湟肥沃之地，农、牧业经济比较发展，又掌握青海湖的鱼和海西的盐，可以左右诸羌部落，共同的经济联系也比较密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联盟组织的关系。西汉三次镇压西羌，都是先零首当其冲。汉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召先零羌豪三十余人尽杀之，使归义羌侯杨玉等“亡所信仰”，失去对汉朝的信任，遂叛出塞，后来又被斩首^①，这些都重伤了先零种羌的感情。自西汉开湟中之地，逐渐设立郡县，加强了对羌族的统治，在羌族内部虽然阶级对立还不明显，但广大羌民与汉朝政府的关系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这样，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用血族复仇的感情，“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②汉代先零羌的部落联盟虽然遭到多次镇压、迫害，但以先零为旗号的部落联盟组织一直在坚持斗争。

钟羌的原居地在大、小榆谷以南及陇西塞外之地，西汉时不曾和汉朝政府发生关系。东汉政府连败先零、烧当种羌，不少羌民徙居钟羌地区。汉和帝末年，汉开拓疆域至大、小榆谷，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东西郡屯田五部，留、逢二部，合计三十四部，与钟羌接壤，并直接威胁钟羌的发展。永初元年（107年）西羌大起义，钟羌积极参加，并力佐滇零。但是，钟羌的活动范围只在陇西塞内外，一直没有离开原根据地。以后，钟羌也参加过几次羌民起义联盟，但未分树旗号。东汉末年，钟羌“胜兵十余万”，成为羌族中最大的部落联盟组织。

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部落联盟，是临时性的部落联盟。这种联盟组织，有的在战争结束后即告解散，有的在战争过程中就各自东西了。因为，当时羌族的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组织，能代表各部落的利益，在斗争中成为中流砥柱，领导各部落不断前进。

上述“解仇”、“交质”、“结盟”组成的部落联盟，都是战争需要结成的临时联

^①《汉书·赵充国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4页。

盟。这种联盟也不少。卑湍种羌杀了强娶羌妇的安夷县吏，县长迫害羌民，卑湍羌杀死县长，怕汉朝报复，遂与邻近的勒姐、吾良种羌联合，组成临时性的联盟组织，抵抗汉朝军队。汉陇西、金城二郡兵至和罗谷，与联盟羌民接战，杀卑湍种羌豪数百人。羌民败，联盟解散。

烧当羌在反对汉朝政府的斗争中，也曾与牢姐、封养等部落结成联盟，一度形成强大的力量。但是，汉朝势力更强，加之经常“诱以财货”，“构离诸种”，甚至挑唆联盟内部互相残杀，使“诸种为仇”^①，这些作法成了瓦解、分化羌族部落联盟的有效手段。可见，羌族的部落联盟组织不能巩固和发展，除本身的原因外，汉朝政府的这种手段也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汉代几次大规模的羌民起义，都曾结成较大的部落联盟，许多部落参加作战，南北呼应，东西配合，给汉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永初元年的西羌大起义，势力遍及凉州、三辅，扩展至并州、益州，还一度在凉州北地郡建立政权，滇零自称“天子”。但是，由于当时羌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建立国家政权的阶段，它的政治、军事水平还不能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因而很快就被东汉政府的武力镇压击败了。

三

国家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当阶级对立已经不能调和时，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调和阶级对抗，缓和阶级冲突^②，这就是国家。“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成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③的话，亦即阶级对抗不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不能产生国家。列宁还说：“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④

现在我们考察汉代西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研究适应于其生产水平的社会关系。

《西羌传》一开头概述羌族的状况时称：“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爱剑教之田畜”，遂渐敬信。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法律是“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这是西汉初年的情况，东汉末年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畜牧和猎获生产一直是汉代羌族的主要生产门类，编入内郡的羌民兼营农业，高原和山谷等塞外地区仍然从事畜牧和狩猎业。

西汉时羌族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主要是湟水中、下游，大、小榆谷和枹罕侯所在的枹罕县，其它地方由于山高谷险，气候寒冷，当时还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湟中地区的农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页。

③同上书，第161页。

④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5页。

业发展情况，据赵充国上书称：“计度临羌东至浩门，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①此羌虏故田是羌民耕种的熟地，“公田”是未开垦的生荒地，“故田”约有多少，赵充国未说明，但不会很多。至东汉初年徙先零大部于内郡，湟中地区的农业已经不是以羌民为主要生产者，而是以汉族移民和湟中杂羌胡为主要生产者了。不仅湟中如此，大、小榆谷自汉击败烧当羌以后，开屯田三十四部，也是利用羌民的耕地。因此，羌民的农业在汉代不仅没有发展，而是逐渐缩小了。

农业生产工具极为简陋。湟中平川有车，赵充国至湟中，见羌人“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②。这种车既是生产工具，又是平川牧民搬家使用的运输工具，在山区不能使用。东汉安帝初年羌民大起义，史载“无复器甲，或以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为象兵”^③，不见铁器，可见铁器在羌族中使用不广泛。汉代羌族中没有冶铁业，没有制造铁器的记载，所用铁器是从汉族交换而来，因而数量极其有限。

即使在农业地区，农业也没有脱离牧业而单独发展，仍然是牧、农兼营。《西羌传》记述先零、烧当相继在大、小榆谷发展起来的原因时说：此地“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④。说明田畜兼营，农业和牧业结合，是先零、烧当强盛起来的主要原因。由于农业发展有限，羌民所需的粮食主要是从与汉族交易中得来，因而“杂谷市畜”^⑤就成了汉、羌交易的重要内容。这种“谷”和赵充国屯田所种植种的谷，都是糜谷，即小米，是羌汉交界农业生产的主要品种，产量不高。

由于农业没有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表现在生活上也没有形成定居点。汉代称羌民为“庐落人种”，称其户为“落”，就是牧、农兼营的内郡，汉朝政府还发兵“覆其庐落”^⑥。“落”、“庐落”、“帐落”，是对牧民的称呼，言其以草庐、毡帐为栖身之所，便于迁徙。先零羌在湟中兼营农业，还要争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⑦，就是农业生产还不能维持其生活，需要以牧业来补充，所以还要过游牧生活。

根据上述可见，汉代羌族的生产是落后的，经济发展是缓慢的，在这种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还不能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不能造成“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成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产生“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

那末，适应这种生产水平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什么呢？

《西羌传》称：“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嫠嫂”，这是氏族公社末期私有制开始出现的标志。《汉书·匈奴传》载中行说为匈奴的这种习惯辩解时说，这是“恶种姓之失也”。实际上，这种习俗是私有财产出现后，为了不使女方改嫁带走氏族和家庭的财产而盛行的一种制度，这在奴隶社会更为明显。但是，汉代羌族的私有制是极为有限的。习惯法规定：“杀人偿死，无它禁令”，说明他们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牧

①②《汉书·赵充国传》。

③④⑤⑥《后汉书·西羌传》。

⑦《汉书·赵充国传》。

场是公有的，耕地是公有的，私有畜产、毡帐还没有提高到法律保护的程度，各部落之间“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说明各个部落的首长议事会能够解决自己内部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正适合这种生产水平，能够组织他们的生产和生活。

这里附带讨论一下“胜兵”是不是脱离劳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特殊等级。东汉时，武都参狼羌，“胜兵数千人”，钟羌“胜兵十余万”。有人认为匈奴的“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南匈奴三万四千户，胜兵五万一千七百七十，被认为这是“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的结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当时的生产水平，平均0.67户养活一个职业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且末户二百三十，胜兵三百二十；小宛国户百五十，胜兵二百人。这些小国还不及内地的一个大村镇，常备兵数超过总户数，也就是说全部主要劳动力（男子）都成了脱离生产的职业兵，由谁去进行生产？这种情况不仅当时生产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就是现在的生产水平下也不可能。因此，对所谓“胜兵”一词，只能根据《史记·匈奴传》解释：“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平时“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战时“人习战攻以侵伐”，是不脱离生产的兵种。匈奴如此，西羌更是如此。羌族在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对抗，没有国家政权以前，更不能出现大量脱离生产的职业常备兵。

西羌族的共同体的发展，从西汉末年年开始，逐渐受到汉朝政府的影响，不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特别是东汉初年，汉朝政府连续击败先零、烧当等羌部落之后，把它们分批迁入内郡，有的编为“保塞羌”，有的列入“义从羌”、“羌骑”等，拆离其原有的部落，与汉人杂居。而逃亡塞外的，最后饥饿贫困，部众死亡殆尽。其内徙者，“或控偃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在汉族豪绅官吏的分别统治下，部落组织无法发展。东汉后期，汉朝政府的统治更向羌中地区深入，郡县有所增加，在郡县制度管辖的羌民部落，只能和汉族劳动人民一道，建立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社会组织，不可能独立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羌族人民不可能沿着独立发展的道路由部落联盟到最后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他们已经成为汉朝政府统治下和汉族劳动人民一样的被压迫阶级，而不再是氏族公社的成员了。因此，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诸内郡羌民积极参加，他们作为农民战争中的一员，为推翻东汉政府的封建压迫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羌族内部也出现了一批特殊阶层，如西汉时的归义侯杨玉，帅众王若零、弟泽，言兵侯阳雕，献牛君摩忘^①，东汉时有西羌校尉、归顺王迁那^②，羌王号封，羌侯雕何^③等，这种王侯当时还不少，仅段熲镇压羌民就“掠得羌侯君长金印四十三，铜印三十一，锡印一枚”^④。这些都是汉朝政府授封的爵位，不是由羌族内部经济发展逐渐分化出来的剥削阶级，因此不能作为羌族本身阶级对抗的标志。

① 《汉书·赵充国传》。

② 《晋书·载记·姚弋仲》。

③ 《后汉书·西羌传》。

④ 《东观汉记·段熲传》。

柔然的兴起及其内部的民族部落组成

周 伟 州

一、柔然的族源、族属和称号等问题

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兴起了一个自称“柔然”的民族。这个民族建立了一个像匈奴那样强盛的国家，活动的地区，最盛时奄有大漠南北及新疆北部，存在的时间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中国史籍中，有的又称它为“蠕蠕”（《晋书》）、“蠕蠕”（《魏书》、《北史》）、“芮芮”（《宋书》、《南齐书》、《梁书》等）或“茹茹”（《北齐书》、《周书》、《隋书》等）。

关于柔然的族源，中国史籍有几种说法：一种是《魏书》的说法，认为柔然是“东胡之苗裔也”^①；另一种是《宋书》、《梁书》的说法，以为柔然（芮芮）是“匈奴别种”^②；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它看作是“塞外杂胡”^③。中外学者大都倾向于《魏书》的说法，把柔然视为东胡中鲜卑的后裔，而对后两种说法则完全否定。这种意见基本上正确。但对后两种说法完全持否定态度，也是欠妥的。

从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柔然应源于东胡，而且是源于东胡中的托跋鲜卑。《魏书·蠕蠕传》说得十分明确：

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木骨闾既壮，免奴为骑卒。穆帝时，坐后期当斩，亡匿广漠谿谷间，收合遁逃，得百余人，依纯突邻部。

从这段柔然始祖传说的记载中，可知姓郁久闾氏的柔然最早是在托跋鲜卑始祖神元皇帝力微后期（力微死于277年）形成的。其始祖木骨闾原是托跋鲜卑贵族的奴隶，因其头秃，故名木骨闾（鲜卑语头秃之意），讹为郁久闾，以后子孙繁衍，均以此为姓

①见《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按此传早已佚，今本此传系宋人据《北史》卷九十八，《蠕蠕传》补成，后者无此句。

②见《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又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十一有《邵久闾伏仁墓志铭》，内云“君讳伏仁，本姓茹茹。夏有淳维，君其苗裔”。史书一般记匈奴是夏淳维的苗裔，故此志似将柔然作为与匈奴同源的民族，与《宋书》等说“匈奴别部”意思相近，故附于此。

③《南齐书》卷五十五，《芮芮虏传》。

氏^①。到托跋鲜卑穆帝猗卢(304—316年)时,木骨闾因获罪,逃亡到广漠谿谷,收集通逃,得一百余人,投依纯突邻部。以后“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②。柔然早期传说的这段历史,明确地指出:柔然是从托跋鲜卑中分离出去的一支。

同时,在《魏书·蠕蠕传》中,柔然一个投降了北魏的首领阿拉瓌(Kuè)曾对孝明帝元诩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元诩回答是,“朕已具之”,表示认可。北魏是由托跋鲜卑所建,而所谓“托跋鲜卑”,乃是东胡鲜卑的一支,它从原始居地不断南迁,与匈奴融合,具有鲜卑父匈奴母的含义在内^③。另一种名为“秃发鲜卑”或“河西鲜卑”的部落,也是鲜卑族与匈奴族融合后的称谓,托跋即秃发,这早已为前人所指^④。如果柔然源于托跋鲜卑,那么它与河西鲜卑也应同源。关于此,中国史籍也有明确的记载。《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云:“时河西鲜卑杜仑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据《魏书》卷二十八,《贺狄干传》,此事在北魏天赐年间(404—408年),“河西鲜卑杜仑”作“蠕蠕杜仑”。可见《晋书》所记之“河西鲜卑杜仑”应即柔然开国首领杜仑,“杜”,形近而讹。称柔然为河西鲜卑(秃发鲜卑),证明柔然、托跋、秃发均有一个共同的族源,都是鲜卑族与匈奴族融合后形成的部落,而柔然是从托跋鲜卑分离出去的一支。

为了进一步说明柔然的族源问题,还必须搞清托跋鲜卑的原居地和早期迁徙的历史。这个问题,过去许多著作均有论述。我们只作简约的说明。据《魏书》卷一,《序纪》说,托跋鲜卑原住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大鲜卑山。有的学者考证,大鲜卑山当在今东北大兴安岭的北段^⑤,此说已为最近在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发现的戛仙(Kaxin)洞内北魏托跋焘致祭祖先的祝文所证实^⑥。到托跋鲜卑最早的始祖毛以后第六世宣皇帝推寅时(约公元一世纪前叶),托跋鲜卑由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北段向南迁徙到“大泽”(今黑龙江呼伦池)。考古工作者在呼伦池东面和北面的完工、札赉诺尔等地发掘到了早期托跋鲜卑的墓葬。从出土文物判断,当时托跋鲜卑是“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⑦。至始祖毛以后十三、十四世的献帝邻、圣武帝诃汾时(约在公元二世纪中),托跋鲜卑又由呼伦池一带南迁,经“九难八阻”,最后“始居匈奴故地”。此匈奴故地,是指阴山北头曼城一带,匈奴头曼、冒顿

①关于柔然“首秃”的问题,文献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南齐书》、《梁书》,说柔然人“辫发左衽”,即同于托跋鲜卑的“索头”一样;一是《魏书》卷一〇三,《悦般国》说,悦般人入柔然境,“见其部人不浣衣,不辫发”,不辫发即髡头。《魏书》明言木骨闾为“首秃”,故髡头一说较为可信。但是也不排除妇女辫发的可能,这一点同匈奴的情况相似。

②《魏书·蠕蠕传》。

③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页等。

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二云:“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谈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即勃勃,发从发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仍起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又《魏书》卷二十九,《源贺传》也云,贺为秃发得檀之子,故托跋焘对源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

⑤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238—239页。

⑥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载《光明日报》,1980年11月25日。

⑦参见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

单于发迹之处。柔然是在诃汾的儿子神元帝力微末期逐渐形成,到穆帝猗卢时从托跋鲜卑中分离出去的。因此,真正柔然的历史应该从木骨闾氏的形成时开始,其最早的居地应为托跋鲜卑最后南迁之匈奴故地,它的兴起也同匈奴一样,是在漠南河套东北及阴山一带。

柔然既然源于鲜卑与匈奴融合后的托跋鲜卑,那么《宋书》等说它是“匈奴别种”,也就有了一部分合理的因素在内。事实上,托跋鲜卑也好,柔然也好,他们形成过程当中,除了融合部分的匈奴而外,还融合了漠北草原中的敕勒(高车)等族在内。所以,《南齐书》称柔然为“塞外杂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十分恰当的。

源于东胡托跋鲜卑的柔然的语言系属,应与东胡的语系相同。关于东胡的语系,过去有的西方汉学家如法国的沙畹(Chavannes)、范穆塞(Remnsat, A)等,认为东胡属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族,这是没有什么根据的^①。近世以来,中外学者大都认为东胡应属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他们当中许多人,如冯承钧、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伯希和(Pelliot, P)等,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探求柔然的语言族系,基本上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柔然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②。这个结论与柔然源于东胡鲜卑的结论是完全吻合的。

下面谈谈柔然的称号问题。

《魏书·蠕蠕传》说,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会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又说,“后世祖(托跋焘)以其无知,状类于蜚(《北史》作“虫”是),故改其号为蠕蠕”。从此知柔然称号始自车鹿会的自称,而蠕蠕之名则是北魏统治者对柔然侮辱性的改称。柔然,今音读作Zōu—Zēn,蠕蠕,今音读作Zū—Zǔ。其余如《晋书》所称之为“𧈧𧈧”,南朝史书所称之为“芮芮”,以及《北齐书》、《周书》等所称之为“茹茹”,皆因音译而字异,致使今读音微有差别^③。在这些语音微有差别的诸名称中,哪一个是比较接近原来的读音呢?过去日本人曾作过一番探讨,并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试图找出柔然称号的原音和意义。如白鸟库吉就以为:《宋书·索虏传》记,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今蒙古语聪明、贤明,读作tsetcen或tsetsen,应即大檀、柔然、蠕蠕的对音^④。藤田丰八认为,柔然即ju—jen,是蒙古语jusun的对音,此语有礼义、法则之意^⑤。我国学者冯家升先生对上述两种意见均不赞同,他根据大同云岗石窟《茹茹造像》拓片,首行有“大茹茹国”的文字,以为:“茹茹国上加大字,必茹茹人自称之辞。……由是吾人可知茹茹乃其自择之字面,非柔然、蠕蠕、𧈧𧈧、芮芮等辞为他人所称者可比。……然则茹茹乃北魏以后,蠕蠕进化而自择之名辞,殆无可疑也”^⑥。

①参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上海1934年商务版,第1—18页。

②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下编,第65—84页;冯承钧:《高昌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载《辅仁学志》第11.12期;伯希和:《汉语突厥名称之起源》,中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下编《西域篇》,第187—209页等。

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二号,“蠕蠕即柔然也。魏书作蠕蠕,宋、齐、梁书皆作芮芮,周书作茹茹,北史有蠕蠕传,而诸传间有作茹茹者,盖译音无定字”。

④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下编,第67—71页。

⑤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下编《西域篇》,第205—206页,昭和八年国学院版。

⑥见冯家升:《蠕蠕国号考》,载《禹贡》,第七卷第8、9合刊。

按大同云岗石窟之“柔然题铭”，在云岗编号为第十八窟窟门西壁上，下部已完全漫漶，上部除个别字还可辨识外，大部分也破毁。从字迹看，题铭共十二行。可辨识的字：首行项格有“大茹茹”三字；第二行首有“可敦”两字；第八行首有“何”字；第九行首有“以”字；第十行首有“谷浑”两字；第十一行首有“方妙”两字。据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鉴定，云岗第十八窟是北魏和平年间（460—465年）最早开凿的五窟之一^①。题铭显然是在窟修成之后，才刻于已被毁坏的西壁上的。时间大约是在东魏时（534—552）所刻^②。冯先生所谓“茹茹”一词为北魏后期柔然自择之名号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一四七，《元恭墓志》记：恭“妇，茹茹主之曾孙”；同书图版五九一，《阎伯升暨妻元仲英墓志》亦记：“公讳伯升……高祖即茹茹主之第二子……。”元恭死于北魏永安三年（530年），伯升死于兴和二年（540年），内称“茹茹主”之后代，且均在北魏后期。

但是，真正接近柔然原音的，我以为并不是“茹茹”一词。在史籍所记五个名号中，接近原音的，应该是柔然人的自称和文献出现较早的称号。

蠕蠕，是《晋书》所记，出现较早。唐代何超《晋书音义》卷下记：“蠕蠕，上音柔，下而充反”，读作Zōn—Zǎn。《魏书·蠕蠕传》说，车鹿会“自号柔然”，今音读作Zōn—Zǎn；北魏托跋焘时被改为“蠕蠕”，《通典》卷一五六“蠕蠕”条记，蠕音而充反，即读作Zǎn—Zǎn。以上三个名号的读音差别是较微的。

芮芮，今音读作Zūi—Zūi，唐代《广韵》去声卷四，十三祭记“芮”而锐切，与今音同。此名是南朝汉人从北魏所称“蠕蠕”一词转化而来。《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胡注：“芮芮，即蠕蠕，南人语转耳”。故其音与上述三名称读音相差较大。

至于茹茹一词，今音读作Zū—Zū。《广韵》去声卷四五御记：茹，人恕切，读作Zū，与今音同。此词起于北魏后期，我认为，也源于蠕蠕一词。蠕蠕，唐韵为而充切，但可能又读作Zū，与今音同。宋代丁度等撰《集韵》平声二，“虞第十”云：“蠕”音为汝朱切，“虫行貌”。茹茹一词或许即蠕蠕另一读音Zu Zu转化而来（由平声转为去声），读作Zū—Zū，意思是“虫行貌”，与北魏统治者改柔然为蠕蠕这个侮辱性称呼的意思相同。故后来柔然人宁接受“茹茹”名称，而不用带侮辱性的“蠕蠕”这一名称。

从上述的分析可看出：蠕蠕、柔然、茹茹三名称的读音差别甚微，出现较早，而且“柔然”一词系车鹿会所“自命”。相反，芮芮、茹茹出现较迟，皆源于“蠕蠕”一词，且读音与上述三词差别较大。因此，柔然（Zōn—Zǎn）的读音应该最接近于该族称号的读音。事实上，这一看法在《魏书·蠕蠕传》中已说得十分明确，本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

“柔然”一词是什么意思呢？白鸟库吉引《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薛禅者，华言大贤也，口聪明之称”。并说：“此文中之薛禅二字，明为tsetseu, Sstsen之对音也，因思柔然或蠕蠕之名，即此tsetseu, Sstsen之音译，原为车鹿食（会）个人自

①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云岗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云岗石窟》，1977年文物出版社，前言部分。

②见拙作《关于云岗石窟的“柔然题铭”》（内刊稿）

称之尊号，后遂移为国号者也”^①。薛，唐韵私列切；禅，时战切，或市连切，读作Ssetsen。柔然和蠕蠕与薛禅可能都是今蒙古语tse—tsen, Sse—tsen的音译。如此，则柔然称号，原意为聪明、贤明之意，白鸟库吉的结论，可备一说。

此外，欧洲的历史著作里一般称柔然为阿瓦尔人(Avars)。此名最早出现于希腊史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中，据书中说，在公元四六一——四六五年，有一种原居住在大洋沿岸、名阿瓦尔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龙蛇侵扰，加上其它民族的侵逼，遂向西迁徙，压迫Savirs族向中亚奔逃。Savirs族又逼迫邻近东罗马帝国的三个民族逃离本土，并遣使向东罗马帝国求援^②。许多欧洲历史学家认为上述的阿瓦尔人就是中国史籍所说的柔然。

可是，自希腊史家普利斯库斯记载了阿瓦尔人之后约一百年间，阿瓦尔人之名再没有出现。直至五五八年，欧洲一些历史文献才又出现了阿瓦尔人之名，并且记载他们出现在今多瑙河中游匈牙利平原上，于五六八年建立了一个“阿瓦尔汗国”，一直存在到九世纪。其间，阿瓦尔还经常侵犯东罗马帝国及斯拉夫人的土地。斯拉夫编年史上又称阿瓦尔人为奥布尔人(Обру)。出现于六世纪中叶的阿瓦尔人是否真是柔然人呢？有的外国历史学家认为这部分自称阿瓦尔的民族中有一部分可能原来是归柔然统治的突厥部落，六世纪五十年代柔然灭亡后，他们即冒柔然(阿瓦尔)之后，向匈牙利、意大利、日尔曼等地侵犯。因此，现在一般外国历史著作均称这部分自称“阿瓦尔人”的突厥部落为“假阿瓦尔人”，称上述希腊史家所述之阿瓦尔人及一部分自称阿瓦尔为“真阿瓦尔人”^③。可是近来日本学者内田吟风撰《柔然(蠕蠕)阿瓦尔同族论考》^④，力主六世纪中入侵欧洲的阿瓦尔人就是柔然残部。

二、柔然的兴起及其政权的建立

《魏书·蠕蠕传》说，柔然始祖木骨间是在四世纪初穆帝猗卢时，从托跋鲜卑中分离出去，投依纯突邻部的。当时，整个大漠南北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托跋鲜卑的部落联盟在二七七年神元帝力微死后，发生了“诸部离叛，国内纷扰”的情况。至二九五年，力微子禄官将托跋鲜卑分为三部：一部由自己统治，居上谷(今河北涿鹿东)北、濡源(今滦河河源，在河北赤城北)西；一部由力微孙猗它统之，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海北)；一部由猗它弟猗卢统之，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北)故城。以后，猗卢南掠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北迁杂胡于云中(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五原、朔方等地。又渡黄河击匈奴、乌桓等部。“自杏城(今陕西黄陵县附

①《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下编，第71页。

②麦喀尔尼(Ma Cartnes, C. A):《论希腊史所载六世纪之突厥历史》，载伦敦东方学院丛刊十一卷。岑仲勉先生有中文节译，载《突厥集史》下册，第941—962页。

③见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第204—208页；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1958年，中华书局版，第202页等。

④文载内田吟风:《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同朋舍版。

近)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①。三〇七年(晋永嘉元年)禄官死去,猗卢统摄三部,势力更加强大,其统治的区域:东起濡源,西至河套,南过长城,达今大同、代县北,北达漠北草原。在这一广大地区,几乎所有的部落均臣属于托跋鲜卑。三一〇年(晋永嘉四年),猗卢协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击溃了西河(治今山西离石)的白部鲜卑,又将铁佛匈奴部刘虎从新兴(治今山西忻县)、雁门(治今山西代县)逐到朔方一带,减少了晋朝北部的边患。因此,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以后,晋愍帝又封其为“代王”。

柔然始祖木骨闾就是在上述猗卢势力扩展的形势下,分离出去的。他投附的“纯突邻部”,应即《魏书·高车传》后附记的“纥突邻部”,纯,形近而讹^②。此部的居地在阴山北面的意辛山(今内蒙锡拉木伦河北)一带^③。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内篇第四,奚氏条的考证,纥突邻即纥豆陵氏,也就是《魏书·序纪》中所云托跋力微投附的没鹿回部。如此,则纥突邻当为鲜卑部落,当时仍役属于托跋鲜卑猗卢。

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会始有部众,从纥突邻部中独立出来,自号柔然。当时,柔然还是一个十分弱小的部落,并仍役属于托跋鲜卑。《魏书·蠕蠕传》说,柔然当时“岁贡马畜、貂纳皮”给托跋鲜卑,“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以后,“车鹿会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为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匹候跋所统之东部大致在原柔然的游牧地区,即今内蒙河套东北、阴山以山一带。缊纥提所统之西部,从河套北向西扩展到额济纳河流域。

到四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原建立的后赵、前燕等相继被前秦苻坚所灭。三七六年前秦建元十二年,苻坚以朔方一带的铁弗鲜卑刘卫辰(刘虎孙)为乡导,率军十万进攻托跋鲜卑。时托跋鲜卑代王什翼犍被秦军击败,率部逃至阴山以北,因救勒(高车)各部的骚扰,不得游牧,遂又返回漠南。后,托跋鲜卑内部发生内讧,什翼犍被其子实君所杀。秦军乘机进占云中,托跋鲜卑所建代政权瓦解。苻坚将原属代国的土地和人民分成两部分,以黄河为界。河以东交原代政权南部大人刘库仁统辖,河以西交刘卫辰统辖,各拜官爵,分统其部。这时,西部柔然首领缊纥提则转投附于刘卫辰^④。

三八四年,刘库仁为部下所杀,其弟刘头眷领库仁部众。次年秋,刘头眷率军击破贺兰部于善无(今山西右玉南),又在意辛山大破柔然别帅胥渥,“获牛羊数十万头”^⑤。从掠获的牛羊数来看,在意辛山一带游牧的柔然数量是很多的。

同年,刘头眷为库仁子刘显所杀。刘显又企图杀死投归他的托跋鲜卑什翼犍孙托跋珪。托跋珪得信后逃离刘显部,转投贺兰部。三八六年,因苻坚淝水大败,托跋珪乘机恢复代国,大会诸部于牛川。四月,托跋珪改国号“代”为“魏”(北魏、后魏)。三

①《魏书》卷一,《序纪》。

②1974年中华书局标点出版的《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已勘改为“纥突邻”。

③《通鉴》卷一百七,晋孝武太元十五年四月,胡注:“意辛山在牛川北,贺兰部所居也”。牛川即今内蒙锡拉木伦河。又正文云:“魏王珪会赵王麟于意辛山,击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破之。”可见,纥突邻部游牧在意辛山一带。

④《魏书·蠕蠕传》。

⑤《魏书》卷二十三,《刘库仁传》。